

《永乐大典》是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,保存了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地理、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,气魄雄伟、内容宏富,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,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,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被誉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,一本百科全书,被另一本百科全书如此称道,举世罕见。

萧山兄弟同修《永乐大典》,大典也记载了萧山、湘湖。

■文/ 傅浩军

修编《永乐大典》的萧山人

“天下古今事物,散载诸书,篇帙浩穰,不易检阅。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,类聚之而统之以韵,庶几考索之便,如探囊取物尔。尝观《韵府》《回溪》二书,事虽有统,而采摘不广,记载太略。尔等其如朕意,凡书契以来,经、史、子、集百家之书,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,备辑一书,毋厌浩繁。”

永乐元年(1403),朱棣为炫耀文治,彰显功绩,下诏要求编修一部大书,还提出了他的编纂宗旨:将中国历代典籍中的各类知识系统整理、分类汇编,以解决文献分散、查阅困难的问题。

随后,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修书,参与编书147人,永乐二年(1404)书成,名为《文献大成》。

然而,朱棣看后不甚满意,认为所纂尚多未备,又命重修,令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姚广孝等担任监修,以下设有副监修、都总裁、总裁、副总裁,以及纂修、编写人、缮录及圈点生等。

朝廷又选拔饱学之士,参与修书。

永乐三年(1405)和四年(1406),礼部大规模征召编修人员,由在朝官员或地方官吏举荐人选,经考核予以录用。姚广孝等人善于识别人才,并能破格任用,无论朝臣文士、还是民间布衣,无不在征召之列,如陈济布衣之身任都总裁,成为制定凡例的重要人物,对编修过程中的疑难问题,都能“应口辨析无滞”。再如滕用亨虽年近古稀,而学问极为博洽,仍参加召试。所选编修人员中,不乏地方府、县训导教谕甚至布衣诸生,一个个学识渊博,功底深厚。

“天下文艺之英,济济乎咸集于京师”,一时间,全国各地文化精英汇聚,参与这项工程的编写人员前后共计2169人,其人文阵容之盛,堪称空前绝后。

两个萧山人也参与了此项盛大的工程。

他们是魏骥、魏骥兄弟。魏骥,永乐元年(1403)考中举人,永乐二年(1404)考中进士,列二甲第四十九名,选为庶吉士,其时,朝廷在庶吉士里选拔人员翰林,他因擅长书法也参与其中。

魏骥(1375－1472),字仲房,号南斋,永乐三年(1405)考中举人,第二年赴考进士,名列副榜,随后被授予松江府训导一职。其时,礼部征召编修人员,魏骥凭借才学脱颖而出,也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。

在姚广孝的主持下,魏骥和其他修纂人员投入编修。

姚广孝曾作《越王台》一首:“犖土为台抱恨深,营门金气尚森森。当时吴破非兵力,只在西施一捧心。”越王勾践卧薪尝胆,最终攻破吴国,凭借并非全靠兵力的强大,而是西施的功劳,极言西施在破吴

《永乐大典》中记载的萧山

《永乐大典》正文为22877卷,凡例目录60卷,装订为11095册,总字数3.7亿字。本书篇幅之大,搜罗之广,缮写之工整,装潢之精湛,成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,也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编修的大型典籍。

本书是中国古代规模空前的类书,系统留存了明代以前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科技等领域的珍贵资料。其辑录视野极具广度,以“包括宇宙之广大,统汇古今之异用”的宏大气魄网罗各类典籍,不仅实现了“上自古初,迄于当世”的时间跨度覆盖,更将文渊阁藏书尽数囊括,无论是经史子集等主流学术著作,还是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等杂家之说,皆被纳入其中,包罗万象。

这部书在文献保存方面有着巨大价值。

《永乐大典》中记录了萧山。《永乐大典》引用了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《绍兴府志》《郡县志》《舆地广记》《元一统志》《元和郡县志》等多本古代典籍文本,对“萧山”历史沿革、名称由来、地理归属等进行了汇总记述,如:“吴王阖闾弟夫槩之邑”,萧山原是吴

中发挥的作用。

魏骥品行端直,治学功底精深,姚广孝很是赏识,他们互有往来,常以吟诗作画为乐。

他们在黄公望的一幅画图中留下了诗文。

黄公望字子久,号一峰、大痴道人,元朝画家,浙江平阳人,曾任中台察院掾史,往来杭州、松江等地,晚年居住杭州笕箕泉,他擅画山水,有《富春山居图》等传世。

养心殿收藏有一卷《沙磧图》墨画,是二等里比较好的,这画是用白宣纸画的水墨画,画上落款“大痴”,是黄公望早年作品里最出色的,算得上是价值千金的画册中的精品。前面是画,后面是题记,卷首有饶介、张雨写的题句,共两处;卷尾有钱肅写的一处题句;拖尾有姚广孝的长篇题跋、魏骥写的题句,还有徐守和唱和的四首诗,等等。

魏骥《黄子久沙磧图》写道:“江村望极际春明,匝地人家唤欲应。芳草一川朝滟滟,娇莺随处柳层层。茅茨偏水遇幽岛,苔径穿云接稻塍。回首夕阳天未堕,老渔犹自未收罾。”以精准的取景、灵动的动静、隐微的情感,将江南春日的生机与田园生活的闲逸融为一体,展现了黄公望的诗画才华,传递出以自然为归、以闲适为乐的审美追求,读之如临画境,如入桃源。

朱棣对本书的编撰极为重视,任何编写环节皆设定严苛标准,即使看似简单的抄写工序,要求也极高,书中严禁出现任何错别字,字迹必须工整规范、不得潦草,更不允许涂抹修改,凡不符合要求者均需重新抄写。书写只能慢,不能快,每日只需完成三页,最大程度保障成书质量。

朱棣对编修要求极高,对编修人员也提供了优裕条件。为使收集资料齐全无漏,皇家图书馆向编修人员开放,皇家图书馆本是“禁中之书”,一般人等不能涉足,即使有关官员也须经过复杂手续才能进入,还只能看某一方面的典籍,而编修人员特准进入,允许阅读,魏骥由此“尽读禁中之书”,“学识益进”;为了让编纂人员来去方便,他们被安排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居住,光禄寺还负责伙食,“朝暮酒饌”,供以茗果,晚餐后,他们还允许散步、郊游;为了慰劳编修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,又特发给“膏火之费”,免掉应当“朝谒”的“朝谒”之礼。诸如此等,保证了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永乐五年(1407)定稿进呈,朱棣进行审阅,这次非常满意,命名为《永乐大典》,并亲自撰写了序言,赞扬此书“上自古初,迄于当世,旁搜博采,汇聚群书,著为奥典”。

王闳闻兄弟夫槩的封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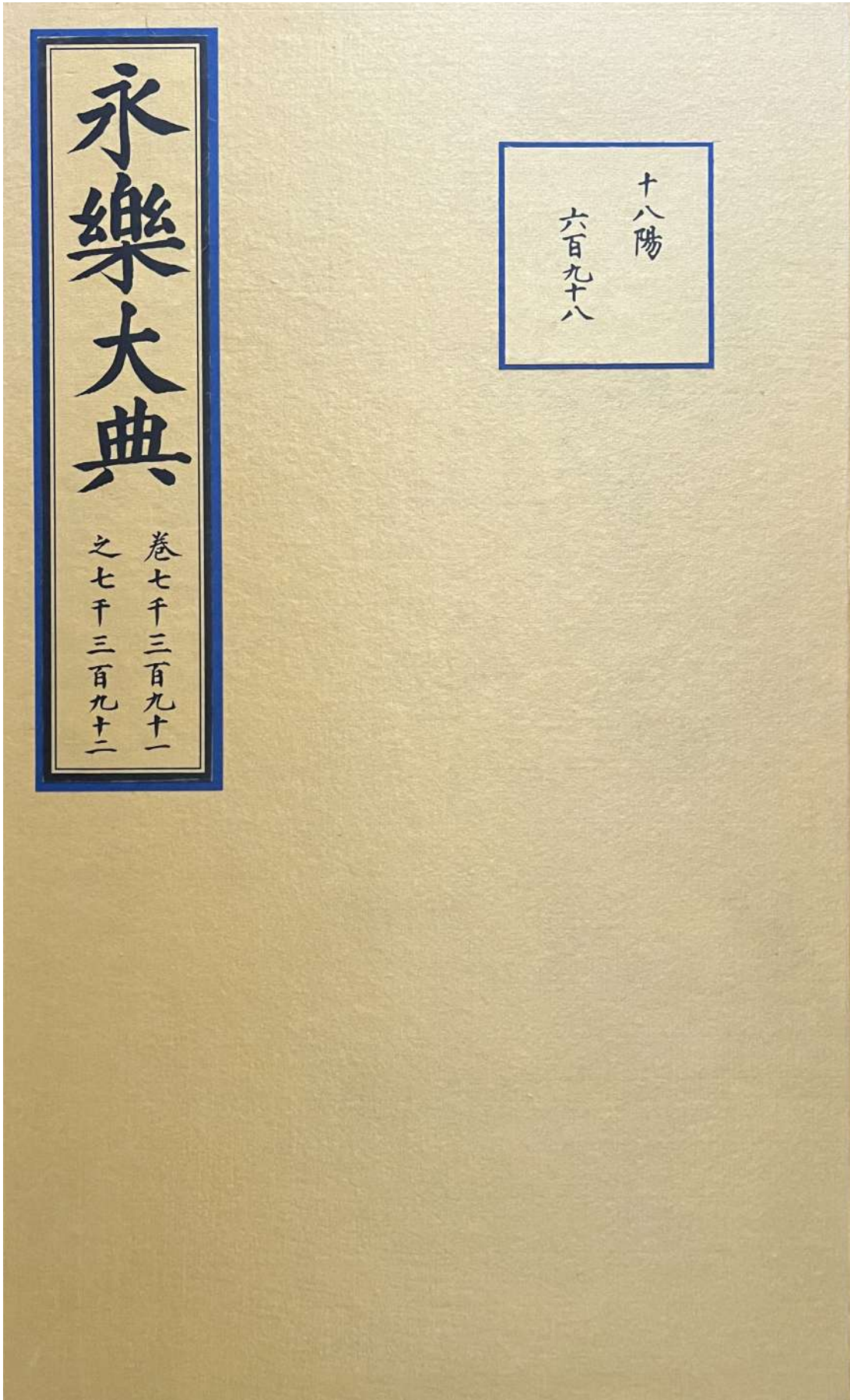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至宋代,县按人口、经济分为“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”七等,萧山的等级,《郡县志》《舆地广记》均标注萧山为“紧”县,“紧”县属较高等级,说明当时萧山的经济地位已经比较重要。

萧山的河流提到“潘水”,并指出《水经注》怀疑潘水是浦阳江的别名,且当时除浦阳江外,当地没有其他河流能对应记载,为研究萧山古代水文变迁提供了线索。

“王莽改曰余衍。”“汉末童谣曰‘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’,故孙权改曰永兴县。”“天宝元年,改名萧山,取县西萧然山为名。”这是历史上萧山县名的几次变化。也提到了西施,《舆地广记》记载“越人西施出于此县”。

等等。《永乐大典》中也记录了湘湖,如:“周八十里,溉田数千顷,湖生菰丝最美,水利所及者九乡,以畋渔为生业者不可数计。”湘湖周长八十里,能灌溉几千顷农田,还盛产品质最好的菰丝;湘湖水利惠及九个乡镇,靠在湖里捕鱼为生的人不计其数。

《永乐大典》中的萧山故事



由杭州名典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的《永乐大典》

“初,崇化、由化、夏孝、昭明、长兴、安养、新义、来苏八乡,皆仰食湖利。乾道中,知县顾冲以许贤二乡距湖水虽差邈,亦可溉及,乃合旧约,益以许贤为九乡,均其利,刻石示众,曰均水约束云。”最初,崇化、由化等八个乡依靠湘湖水利生存,南宋乾道年间,知县顾冲认为,许贤虽然离湖稍远,但湖水也能灌溉到,把许贤纳入进来,一起分享湘湖之利,还刻了石碑公示众人,碑文叫《均水约束》。

等等。《永乐大典》中还有一张萧山地图:图中绘出了萧山县城,24个都的分布,以及湘湖、杭州湾岸线的状况,为现存反映萧山县域的最早舆图。

《永乐大典》修成后,朱棣对姚广孝等人进行嘉奖,“赐广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钞有差”。其时,人们无不以参加编纂此书为荣耀,凡官员者均会记录在履历之中。

魏骥通过修书,人品才学进一步得到人们认可。不久,由于大师师達的推荐,魏骥升任太常博士。官职不大,可是这个职位并不容易得到。

朱棣召见魏骥,说道:“当年刘履节做了九年的御史,资历深厚,高皇帝才授给他太常博士一职,这个职位是不轻易给人。”朱棣用朱元璋时期的案例告诫魏骥,朝廷对太常博士一职很重视,你能得到这个职位,是因为朝廷认可你的能力,此职分量很重,你需珍惜并尽职。

太常寺是明代掌管祭祀、礼仪的中央机构,博士是太常寺的属官,负责起草礼仪文书、解读祭祀制度,此职虽不掌实权,但属京官,且贴近朝廷核心礼仪事务,比地方训导的级别显著提升。

魏骥从地方学官到中央京官,这是他仕途的重要转折点。其后,魏骥迁北京吏部考功员外郎、南京太常寺少卿、北京吏部侍郎、北京礼部侍郎、南京吏部侍郎、南京吏部尚书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沧桑与新生

《永乐大典》编修完成后,仅有一部,人们称之为“永乐正本”,长期封存于皇家档案馆内,鲜有人见。

一百多年后,这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、凝聚无数人智慧心血的稀世巨著,遇到了一位“知音”——嘉靖皇帝。他对《永乐大典》喜爱至极,不仅时常翻阅,还会特意在书桌上摆放几册,以便随时取阅,堪称这部典籍的“铁杆推崇者”。其间,宫中突发火灾,《永乐大典》险些毁于烈焰,嘉靖皇帝担心不已,当即令高拱、张居正等人负责抄录一部份,后来人们称这部抄本为“嘉靖副本”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《永乐大典》不断散佚,厄运接连,“永乐正本”消失无踪,“嘉靖副本”也历经磨难。清朝乾隆年间,浙江萧山人朱筠上书朝廷,请求编纂《永乐大典》辑佚本,还直接促成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。

在朝代更迭与内忧外患的动荡中,《永乐大典》屡遭劫难,偷盗、抢掠、焚烧:咸丰十年(1860),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,翰林院遭到劫掠,大量典籍受损;光绪元年(1875),朝廷修缮翰林院时清查典籍,所存《永乐大典》不足5000册;光绪二十年(1894),萧山女婿、协办大学士翁同龢,奉命进入翰林院再次清查,此时《永乐大典》仅余800册;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烧杀抢掠之下,《永乐大典》又大量丢失;1912年,翰林院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移交京师图书馆,仅剩64册。《永乐大典》散逸到了世界各地。

目前,全球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共400余册,仅占原书的4%左右。

“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,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”卷帙浩繁的典籍藏书,是中华文化的一座座山峦,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、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。

一直以来,国家努力在全球、全国各地收回残卷,又陆续以影印方式出版。

2014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大学考察,指出:中华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,如同一座宝藏,一旦探秘其中,就会终身受用。他还向学校赠送了《永乐大典》影印本。

2020年,两册嘉靖本《永乐大典》忽在法国拍卖会上现身,分别为“湖”字册、“丧”字册,经过一番激烈竞拍后,一位浙江收藏家以巨资成功拍下,又克服重重困难,顺利回国。

2025年1月,杭州国家版本馆限时展出《永乐大典》真本一册,即“湖”字册,吸引了数万人前来,一睹真容。本次展出后,这一珍贵文献随即进入休眠保护期。根据珍贵文物保护的要求,平时展示的基本是仿制品。杭州国家版本馆内,平时陈列着的两册影印本《永乐大典》,也成为市民游客“打卡”点之一。这两册《永乐大典》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,印制则在萧山,由杭州名典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,它们开本雄伟,尺寸巨大,长约50厘米,宽约30厘米,装帧精美,庄重大气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,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。